

## 国内泛突厥主义研究述评<sup>〔\*〕</sup>

○ 段会平,魏国红

(石河子大学 政法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泛突厥主义是一种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它主张将亚洲中、西部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大突厥斯坦”帝国。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产生对中亚和世界的政治局势、对中国和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泛突厥主义的行动、运动以及对策,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关键词]**泛突厥主义;东突;三个主义

泛突厥主义是一种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它主张将亚洲中、西部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并最终建立“大突厥斯坦”帝国。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产生对中亚和世界的政治局势、对中国和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一、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和特点

#### (一)泛突厥主义的产生

##### 1. 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

在研究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时,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的背景是突厥学研

---

**作者简介:**段会平(1970—),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魏国红(1968—),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维汉族群政治心理与族群关系研究”(编号:13BZZ0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双泛’思想的渗透、危害及对策研究”(编号:14AZZ00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维汉族群政治心理与边疆安全研究”(编号:12YB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究的兴起、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抵抗。比如王淑梅认为：“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有三：一是突厥学的实践；二是‘民族国家’理论及‘民族原则’；三是‘泛’思潮的兴起。”“泛突厥主义凭借突厥学的实践，在欧洲的‘民族国家’理论和‘民族原则’以及‘泛’思潮（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sup>[1]</sup>敏敬认为“泛突厥主义是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影响下……‘发掘’突厥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神话传说等方面的遗产，宣扬‘突厥种族优越’论”。<sup>[2]</sup>贾春阳认为除上述三个主要背景外，还有一个背景原因是“民族压迫和国际斗争的产物”。<sup>[3]</sup>还有一些研究者从文化、语言、宗教、政治四个方面来研究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比如刘亚东认为“文化基础——突厥文化的发掘、语言基础——突厥语的稳定和扩张、宗教基础——伊斯兰教的排异性、政治基础——沙俄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射”是泛突厥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sup>[4]</sup>

## 2. 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在90年代初钟国发、李绍先、潘志平、王淑梅等人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泛突厥主义产生于俄国，兴盛于土耳其，并传播到中亚和中国的新疆。“泛突厥主义思潮最先萌发于19世纪末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少数知识分子中间”，“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在南俄和中亚一带知识分子中间迅速扩展”，“20世纪初叶，泛突厥主义在垂死挣扎的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中找到了拥护者和崇拜者。”<sup>[5]</sup>而贾春阳则认为“泛突厥主义思潮最早出现于匈牙利，但真正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则始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鞑靼人地区”。<sup>[6]</sup>杨增耀与上述学者不同，他认为泛突厥主义有两个发源地，“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孕育于19世纪后期的突厥语系民族地区和奥斯曼帝国，产生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土耳其。”“俄国人统治下的鞑靼斯坦、克里米亚、高加索则是泛突厥主义的另一个发源地”。<sup>[7]</sup>

关于泛突厥主义的发展过程，学者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泛突厥主义产生之后，在土耳其兴盛起来。被公认为使泛突厥主义第一次成为系统化、条理化的经典之作——《突厥主义原理》，就是由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祖师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年）所著。“十月革命前后，伽思普林斯基、阿克楚拉、托甘等鞑靼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事业，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运动”。<sup>[8]</sup>

“泛突厥主义迄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 作为对泛斯拉夫主义反应的俄国鞑靼斯坦的‘语言、思想、行动’的‘三统一’活动。2. 19世纪末以后，奥斯曼精英‘重新发现’的泛突厥的历史文化。3. 十月革命以来，从土耳其、中亚到新疆的以反共为主流的政治、文化活动”。<sup>[9]</sup>“泛突厥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鼎盛—蛰伏—复苏—衰落—重振—衰落这样几起几落的过程”。<sup>[10]</sup>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跨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努力保持自己的活跃状态，也一直努力进行对新疆的深入和渗透，因此，中国应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 (二) 泛突厥主义的概念和特点

### 1. 泛突厥主义的概念

在研究泛突厥主义的概念时,一些研究者首先从考察突厥、突厥人、突厥语、突厥民族、突厥主义这些概念入手,比如张建军、姜勇的《泛突厥主义与突厥主义比较》。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泛突厥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对泛突厥主义概念进行了总结。朱克柔写道:“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突厥语系民族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最基本的政治内涵可概括为世界上突厥语言各民族联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土耳其领导下建立一个庞大的突厥帝国”;<sup>[11]</sup>李绍先指出“泛突厥主义者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所谓‘突厥民族’。泛突厥主义的经典《突厥主义原理》认为,民族不是由种族、血亲、地理环境、政治和意志等因素构成的集团,而是由分享共同语言、宗教、道德、美学,也就是受同样教育的许多人组成的团体。每个人都借助于感觉属于一特定的民族,凡自称‘我是突厥’的人就是突厥人。突厥主义就是要发扬光大‘突厥民族’”。<sup>[12]</sup>“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等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系为一体,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sup>[13]</sup>不管是怎样的表述,中心意思就是:泛突厥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和势力,最终目标就是把操突厥语的突厥人或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并建立突厥大帝国。

### 2. 泛突厥主义的特点

在研究泛突厥主义的特点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与考察。

刘宾认为泛突厥主义有两种类型:文化性与政治性,也就是具有文化与政治相生相伴的特点。“前者主要是指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后者则主要指有组织、有纲领,旨在实现所谓‘突厥民族’统一的政治活动”。<sup>[14]</sup>两种类型的泛突厥主义自始至终相生相伴,“每当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受到挫折后,就以文化泛突厥主义的形式蛰伏下来,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就会演化为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泛突厥主义是政治泛突厥主义的基础、母体、温床以及庇护所”。<sup>[15]</sup>

张建军、姜勇把泛突厥主义分为“文化泛突厥主义”和“武化泛突厥主义”,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文化泛突厥主义的特征有五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二元结构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抽象化的“共同”文化观、自相矛盾的国家观;武化泛突厥主义的特征是极端的民族统一主义,公开声明其目的就是兼并国外“突厥民族”所居住的领土,主要手段是通过暴力颠覆、武力争夺、极端恐怖制造政治离心和分裂事件,以“解放”所有“突厥民族”,并最终实现“统一民族国家”的目的。<sup>[16]</sup>

泛突厥主义是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运动。钟国发认为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通过超国家、超民族的组合来增强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竞争能

力,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利用民族间历史文化传统的某些因素为纽带,也是易见成效的。<sup>[17]</sup>

## 二、泛突厥主义与我国的国家安全

国内关于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在“9·11”之前,主要是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比较少地涉及到与中国及新疆地区诸如“东突”和“恐怖主义”等问题的联系。“9·11”之后,泛突厥主义与国家安全、分裂、恐怖等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并成为“双泛”研究的重要课题。如蒲瑶在《理论导刊》2002年第5期上发表《泛突厥主义与中国西部安全》一文,把泛突厥主义与中国西部安全的关系问题作了简单的阐述;叶边、吴宏伟的《昔日突厥今何在(上、下)——泛突厥主义与“东突厥斯坦”迷梦的历史迷误》(《世界知识》2002年第5、6期)、李琪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2004年)等等。学者们在“9·11”后把“泛突厥主义”“东突”“分裂”和“反恐”作为研究重点的同时,国内的博士和硕士也把这些作为毕业论文进行了研究,主要有:2002年外交学院王刚的硕士论文《冷战后的泛突厥主义和“东突”恐怖主义》、2003年新疆大学硕士宋新伟的《论“东突”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朱健的《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及我们的对策》;2009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李培元的《泛突厥主义与中国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外交学院硕士李琨的《“东突”问题中的国际因素》。在这些研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危害以及我国应对泛突厥主义的措施和策略。

### (一) 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学者们在研究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危害时,主要是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国际关系方面来论述的。

#### 1. 对政治领域的影响

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首要表现就是在政治领域。“泛突厥主义对我国的影响首当其冲在政治领域方面。无论是二十世纪初期老牌的泛突厥主义者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以期实现民族分裂、国家分裂的目的,还是之后在南疆建立分裂政权,走上具体化的‘疆独’道路,以及在新时期与恐怖主义结合而产生‘东突’恐怖主义势力,最先都在政治领域掀起轩然大波,不仅影响最深,迫害威胁亦是最大的”。<sup>[18]</sup>“来自西北的威胁一直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隐患。特别是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复苏,以及与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东突’恐怖组织的勾搭,更加重了对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危害”。<sup>[19]</sup>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泛突厥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政治领域的影响和危害首先表现为挑战国家主权、破坏国家统一。泛突厥主义从传入中国以后,不管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打出什么样的口号、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脱离中国管辖而独立存在的国家和政权;其次,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泛突厥主义的思想、言论和活动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导致民

族分裂与民族冲突,他们“一面大力扶持境内分裂主义分子从事民族分裂活动,挑起民族分裂情绪,另一方面勾结国际敌对势力,针对境内各民族挑起事端、煽动排汉情结,甚至从事诸如暗杀、爆炸、纵火等恐怖活动,妄图破坏建国后确立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保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各项民族政策。”<sup>[20]</sup>

## 2. 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经济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的结合”。<sup>[21]</sup>泛突厥主义对国家经济领域的影响和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造成人民群众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泛突厥主义者袭击的对象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国别民族。这几年来为加大恐怖气氛,吸引世界目光,增加了对政府机关、公共场馆的袭击数量,严重扰乱了社会稳定,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对经济运行环境的破坏,打击经济投资的信心,制约经济的良性发展。他们为了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强调要用暴力手段来破坏经济建设。在他们的宣传册上公开鼓噪“去破坏中国的经济目标”。他们的分裂和恐怖活动所到之处,政府机构就不能正常运转,人民群众无法安心生产生活,国家的重大投资和建设项目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东突”分裂组织在我国新疆地区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还恶化了边疆的投资环境,影响了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有利形势和良好开端,加大了我国吸纳国际资本的风险。<sup>[22]</sup>

第三,增加打击泛突厥主义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新世纪以来,国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7·5”以来,国家为了打击暴恐、维护社会的安定局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员和装备,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如果没有恐怖的事件和活动,这些投入是完全不必要的。

## 3.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泛突厥主义思潮趁势而起之时便是国际关系微妙时刻。在国内制造一系列暴动暴乱之后,泛突厥主义者总是借着人权口号在国际上寻求同情、支持,并诽谤中国政府,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

第一,对与我国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中亚一直以来都是泛突厥主义者的活动基地之一,也是中国新疆泛突厥主义者的居留地之一。中亚诸国的政治极端组织对新疆的泛突厥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中国的一些泛突厥主义者到中亚接受培训、训练后,再回到国内进行泛突厥主义宣传和进行暴力的恐怖活动。如此一来,泛突厥主义者利用地缘之便进行危害国家的活动,这对中国和中亚诸国的国家安全也有着严重的威胁。

第二,对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影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分化中国,实行双重标准,故意把“东突”问题说成是“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甚至提供资金支持。“泛突厥主义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分裂中国的工具,致使‘疆独’这一内政问题‘国际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疆独’势力分裂祖国的一系列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到

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支持”。<sup>[23]</sup>因此,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围绕“东突”“疆独”及一系列相关事件中态度、认识不一,由此所引起的争论、冲突在所难免,也必然会对中美、中欧的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三,对与土耳其国家关系的影响。土耳其作为老牌的泛突厥主义的国家,对中国的泛突厥主义态度是纵容或支持,土耳其利用中国国内泛突厥主义宣称的所谓“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等问题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指手画脚,甚至默许中国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在其境内活动或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这样一来,泛突厥主义、“东突”就成为中土两国发展良好关系的一个障碍。

## (二)我国应对泛突厥主义的措施

### 1.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项制度自实施以来,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民族关系的和谐与融洽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天,我国在应对泛突厥主义思潮威胁的情况下,必须仍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在制度上能够消解泛突厥主义根基,这项制度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相处,而且其可以民族自治,故而继续坚持这项制度有利于新疆少数民族在心理上认同多民族的国家,在现实中满足制度供给,使其不需诉求于极端民族主义,这样泛突厥主义也便逐渐丧失生存土壤。”“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所以自治必须要首先服从中央,服从整体。自治的前提是不能损害中央的权威和整体的利益。同时平衡‘自治’与‘共治’的关系,保证国家对地区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同时确保少数民族参与政治和民族管理的权利,使其在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之中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sup>[24]</sup>

### 2. 发展经济,缩小区域差距

建国后,新疆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内地相比,区域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要解决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必须要发展新疆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也曾表示,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搞好当地的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其他问题,经济发展是个关键,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重点”。<sup>[25]</sup>

### 3. 加强思想文化教育

思想文化战线是抵制泛突厥主义的阵地。思想文化教育关系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树立,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义,首先就是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行洗脑或扭曲,所以思想文化是抵制泛突厥主义与恐怖主义的重要阵地。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或者会议,向当地群众普及相关知识,使人民及时、深刻了解新疆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教育人们提防泛突厥主义的蛊惑或欺骗。<sup>[26]</sup>同时还要对民众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和宗教知识的教育,使人们正确认识宗教,能够区分宗教与极端宗教主义、宗教组织与非法宗教组织的区别,使宗教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

### 4.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人员、资金、文化、思潮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同样,泛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极端的跨国的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在国家之间、人员之间传播,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跨国的泛突厥主义的活动甚至是暴力恐怖活动。因此,打击泛突厥主义尤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国与国之间可以加深了解和理解,可以共享反恐信息,共同开展反恐行动。

### 三、泛突厥主义与新疆

泛突厥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并且在之后的新疆历史上起伏伏,造成新疆动荡迭起,直至近代、当代的“东突”和“三个主义”与恐怖事件,所以,泛突厥主义与新疆问题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

#### (一) 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渗透和泛滥

泛突厥主义在 20 世纪初通过办学、传教开始向新疆渗透。杨延冰在其硕士论文《“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国家安全》中阐述了泛突厥主义向新疆渗透并蔓延的原因:“一是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受封建剥削压迫,要求解放,反抗压迫剥削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二是自 1884 年新疆建省后,有 30 多年相对稳定的发展,民族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发展。三是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的宗教意识容易形成共鸣。”<sup>[27]</sup>关于渗透的路径,贾春阳认为有两条:“一是由俄国的鞑靼斯坦经中亚传入,另一条是由土耳其传入”。“正是俄国鞑靼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对新疆的积极渗透,加上新疆本土泛突厥主义分子不遗余力的鼓噪,才导致泛突厥主义思潮迅速在新疆泛滥”。<sup>[28]</sup>泛突厥主义也从此成为“东突”分裂主义思想的来源。“泛突厥主义”不仅为新疆“东突”恐怖势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而且“泛突厥主义”的传播也为民族分裂活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新疆资格最老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及其两个追随者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长期从事反共、反华的民族分裂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东突”主要人物在新疆联合政府中占据高位。大肆宣传“双泛”思想,一直到死。今天艾沙的儿子艾尔肯在国外则继承了其父的衣钵,继续从事分裂活动。<sup>[29]</sup>

冷战结束后,泛突厥主义又呈复苏抬头之势,尤其是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更为嚣张,土耳其也因此成为泛突厥主义向我国渗透的大本营。“目前,国际上各种泛突厥主义分子再次将目光转向中国新疆,利用电台、书刊、互联网、音像制品、学术文化活动等方式疯狂地向新疆传播泛突厥主义思潮。”<sup>[30]</sup>

#### (二) 泛突厥主义与“东突”和“三个主义”

泛突厥主义从清末至民国初年渗透到我国新疆之后,就成为影响新疆地区与中国安全与稳定的一个毒瘤。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突”恐怖势力和“三个主义”方面。

“东突”恐怖势力是指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

“东突厥斯坦国”的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突厥斯坦”本来是中亚一个古老地名,是指古代突厥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具体指今天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新疆侵略,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末前后,“东突厥斯坦”一词与泛突厥主义一起渗入新疆。

“三个主义”是指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者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煽动民族仇视情绪,制造宗教狂热,大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试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在“9·11”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峰。

关于泛突厥主义与“东突”和“三个主义”的关系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泛突厥主义是“东突”和“三个主义”的理论来源和依据,也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它的泛滥和传播也为“东突”和“三个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反共、反华的分裂主义分子。高永久、李丹认为“新疆周边的中亚国家‘泛突厥主义’的泛滥是‘东突’恐怖势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sup>[31]</sup>段志丹也认为“泛突厥主义系‘东突’运动寻找其‘民族遗产’和‘民族性’根源进而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基础和媒介”。<sup>[32]</sup>

关于“东突”与“三个主义”的活动方面,“东突”分裂分子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就开始发动叛乱。比如1933年11月12日,“东突”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年11月12日又在新疆伊宁市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陈超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与杨增新的对策》、纪大椿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危害》、杨发仁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是新疆动乱的思想根源》等,他们在文中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双泛”主义思潮在新疆的传播和“东突”早期的活动。冷战结束后,“东突”的活动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在新疆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2001年短短的十年时间,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仅在新疆就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sup>[33]</sup>2014年5月23日到2015年4月30日近一年时间,新疆共打掉暴恐团伙181个。<sup>[34]</sup>从“7·5”之后到现在,有关反对恐怖主义的文章有上百篇,多是从恐怖主义理论、恐怖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东突”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以及从如何应对来研究的。比如潘志平的《中国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1年第3期)和《中国反恐研究八大前沿议题》(《新疆大学学报》2012年9月)、李慎的《当代“东突”恐怖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探析》(《犯罪研究》2010年第4期)、樊有辉的《“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成因分析》(《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7月)、袁新涛的《“东突”势力的分裂恐怖活动及其防范打击之策》(《理论界》2013年第4期)等等,此处不一一列举。但从长期来看,泛突厥主义与“东突”和“三个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威胁新疆社会安全与中国稳定局面、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难题。

### (三)杨增新与泛突厥主义



1912年,杨增新上任新疆省长,1928年遇刺身亡,任新疆省长17年,是民国时期新疆在位最久的一位要员,也是获得评价较高的新疆要员。最近几年,学者在研究“双泛”问题时,对民国早期杨增新主政新疆时防范“双泛”的政策和措施给予了关注。“杨增新以预防为主,怀柔和务实并举,内外兼施,通过严防‘双泛主义’分子入境,尊信阿訇,严查学校教育和查禁私设的道堂等措施,来防范‘双泛主义’思想的传播,收效明显,对维护边疆的安全和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sup>[35]</sup>“省长杨增新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和限制措施:禁止外国阿訇来疆传教,限制并曾一度禁止新疆穆斯林朝圣,通令各地查禁各类学校聘任外国人作教师,对境外邮寄宣传品稽查甚严,并监禁了一批宣传双泛主义思想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泛主义在新疆的传播”。<sup>[36]</sup>他在任期内争取和创造一切便利,“疏”与“堵”相结合,从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双泛”思潮的传播。但杨增新的措施也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起到长期防范的作用;同时杨增新的一些“高压”政策,为以后“双泛”主义重新在新疆的传播埋下隐患。<sup>[37]</sup>这方面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2013年闫忠林和郝建英发表在《前沿》第10期上的《论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的防范》和2014年杨俊杰发表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的《杨增新抵制“双泛”思潮措施述评》。他们对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应对“双泛”问题的得与失进行了研究分析,可以取其精华,吸取有益的经验而抛却其不良做法。

#### 四、结 论

1. 研究泛突厥主义要加大对俄国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力度。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突厥、泛突厥主义的比较及其特点研究得比较多,尤其更多地研究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而较少地关注了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而俄国是泛突厥主义的发源地,与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国、中亚诸国与中国接壤或相近,与新疆跨境民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要加大对俄国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力度。

2. 不管是研究土耳其或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还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泛突厥主义,学者们都不单单是研究泛突厥主义的来龙去脉,而是要研究它的行动、运动以及对策,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3. 仍需关注本土“东突”“三个主义”“三股势力”。从2009年“7·5”以来,有关“三个主义”和“三股势力”的文章非常多,反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已经成为官员、学者和普通群众的共识。尤其是“2014年,国内极端势力制造了一系列暴恐事件,其中新疆极端势力活动更加频繁,并有一些新的表现:跳出新疆,暴恐活动外溢;滥杀无辜,残忍之极,无以复加;有精心的组织和预谋;视频洗脑、网络动员、小团伙作案;暴恐成员低龄化、且有女性参加。”<sup>[38]</sup>针对这些新的表现,研究的热点问题也与此相关。因此,学者们仍要思考如下问题:“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

股邪恶势力能在新疆肆虐至今? 暴恐成员低龄化的原因是什么? 经过多年的宣传、打击,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其中? 由此来看,反对“三个主义”、打击“三股势力”仍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 注释:

- [1][8]王淑梅:《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第31-33、31-38页。
- [2]敏敬:《“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第11页。
- [3][6][23][28][30]贾春阳:《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世界民族》2011年第1期,第4、4、9、7、8页。
- [4][18][20][24][25][26]刘亚东:《泛突厥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4、17、18、23、25、25页。
- [5][12]李绍先:《泛突厥主义的来龙去脉》,《国际研究参考》1992年第7期,第19页。
- [7][9]杨增耀:《论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基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14页。
- [10]陈延琪:《泛突厥主义文化观透视》,《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84页。
- [11]朱克柔:《对泛突厥主义的几点认识》,《西亚非洲》1993年第4期,第59页。
- [13]蒲瑶:《泛突厥主义与中国西部安全》,《理论导刊》2002年第5期,第52页。
- [14]刘宾等:《文化泛突厥主义研究》,杨发仁编:《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1994年,第240-241页。
- [15]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页。
- [16]张建军、姜勇:《泛突厥主义与突厥主义比较》,《昌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9-30页。
- [17]钟国发:《泛突厥主义考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4页。
- [19][21][22]李培元:《泛突厥主义与中国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3、18、18页。
- [27]杨延冰:《“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国家安全》,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19页。
- [29][31]高永久、李丹:《“东突”恐怖势力的“思想体系”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7期,第109、110页。
- [32]段志丹:《“东突”运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产物》,《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38页。
- [33]《中国通缉“东突”要犯》,《环球时报》,2003年12月17日。
- [34]微信公众号“王大豪新观察”,2015年5月25日。
- [35][37]闫忠林、郝建英:《论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的防范》,《前沿》2013年第10期,第29页。
- [36]杨东平、张砾、谢贵平:《近代“双泛主义”思潮对新疆民族教育的渗透破坏及其危害》,《塔里木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第63页。
- [38]潘志平:《2014极端势力活动“外溢效应”明显》,《人民论坛》2015年第1期,第52页。

[责任编辑:书缘]